

陈仓荟萃

三千年前的小火锅

◎王睿

对于吃货来说,没有什么不开心是一顿火锅拯救不了的。如今最受人们欢迎的美食可能就数火锅了,它可以边煮边吃,汤物合一,酣畅至极。其实火锅并不是近代人的创举,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,古人就已经在使用类似的器物,考古学家称之为“温鼎”,应该说它就是现代火锅的鼻祖。

1974年,宝鸡市茹家庄一号墓出土了一件造型十分奇特的青铜器——带盘夔足鼎。这件鼎通高16厘米,口径12.4厘米,腹深3.8厘米,重0.85千克。器身分为上下两层,上层为立耳浅腹的圆鼎,下层为带十字镂空圆形托盘。鼎足则被设计成3条扁体的夔龙形,夔龙昂首托鼎,卷尾触地。圆鼎的口沿下装饰有兽面纹,简洁明了,疏朗有致。据专家考证,这件带盘夔足鼎就是西周时期的温鼎。上层圆鼎用来盛放食物,下层托盘用来放置炭火加热食材。而十字镂空有利于空气流通,使木炭充分燃烧和去灰,设计科学,集中体现了商周青铜器实用性及装饰性的完美结合。

宝鸡考古发现西周温鼎共有5件。其共同特征是:形体较小,鼎腹较浅,自带火盘或火膛。这类温鼎到汉代发展成染炉,染就是涮的意思,当代流行的火锅,就与它们有着明显的渊源。

商周时期,人们大多习惯席地而坐,现在所说的“筵席、酒席、坐席”等词就是由此延伸而来。在当时人们要想吃到热的食物,又不能引发火灾,就发明了这种带有托盘或火膛的温鼎,既实用又安全。从这件带盘夔足鼎来看,其容量只适合单人使用,这也证明了西周已经实行分餐制。当时古人将大鼎中煮熟的肉放在矮小的俎案上,用青铜匕分割成小块,青铜豆里盛放着各种口味的酱料,夹一块温鼎中热乎乎的肉食,蘸着酱料就可以享用滑嫩鲜美的肉食了,再伴着耳边动听钟鼓之声,“钟鸣鼎食”这个成语大概就是描述这样的场景。

贵族的饮食习俗是西周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册命分封、赏赐庆功、祭祖敬天等重要礼仪活动,往往都要举行宴飨,从座席的排序到餐具的使用,以及食物的种类等都有严格的规定,这种“一人一食”的分餐习俗,也是实现西周社会“明尊卑,别上下”礼乐教化的重要途径之一。

周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,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最直接的源头。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,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,为了健康,全社会大力倡导分餐制,这与带盘夔足鼎所反映的三千多年前周人的饮食习俗不谋而合,这就是当下我们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,更是对文化自信最好的诠释。

(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讲解员)



带盘夔足鼎



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孟鼎 王星 摄

西周禁酒令

◎郭龙

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。“劲酒虽好,切莫贪杯。”过量饮酒不仅伤身,也容易误事。近年来,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酒驾查处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,“喝酒不开车,开车不喝酒”口号深入人心,各地对公职人员饮酒也作出了规定,人们习惯称之为禁酒令。其实,通过政策对人们饮酒行为加以限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,最早的禁酒令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早期。

“殷鉴不远”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,意思是周王朝的子孙应以殷商的灭亡为鉴戒,后泛指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。周灭商后,周人对商王朝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,认为“嗜酒”便是其中之一。

那么,商人嗜酒究竟到了什么程度?《史记·殷本纪》记载,商纣王用酒当作池水,把肉悬挂起来当作树林,让男女赤身在其间追逐嬉闹,通宵达旦。这是司马迁对商纣王沉湎于酒的描写。文献记载也许有夸张的成分,但考古成果是不容置疑的。近年来,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酒器不仅种类丰富(爵[ju é]、觚[gū]、斝[ji à]、觶[zhì]、觥[gōng]、尊[zūn]、彝[lí]、卣[yǒu]、盍等),而且数量众多,等级不同的墓葬出土的酒器数量由数件到上百件不等。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,墓中出土的酒器达149件。商人嗜酒之风可见一斑,这自然成了新生的周王朝总结教训的反面教材。

生动记述这一史实的铜器便是西周早期的大孟鼎。大孟鼎于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,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器方立耳,平沿外折,敛口,鼓腹,圈底,三柱形足;口沿下饰一周兽面纹,足根饰兽面,均以云雷纹作地。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。通高101.9厘米,口径77.8厘米。铭文内容分两段,上段是周康王对孟的告诫,下段是周康王对孟的赏赐。在告诫之词中,周康王道:“酒无敢酖……我闻殷坠命,唯殷边侯、甸与殷正百辟,率肄于酒,故丧师。”大意为:“不敢沉湎于酒……我听说商朝之所以坠丧天命,是因为他们的诸侯和朝中的各级官员都酖酒,故而完全失去了民心。”为避免重蹈商王朝灭亡的覆辙,周康王明确要求自己的官员不能酖酒,可谓是对他们下了一道“禁酒令”。

那么,这道“禁酒令”的效果如何呢?

考古发掘显示,西周早期的贵族墓中仍然有大量的酒器随葬,宝鸡地区如戴家湾墓地、石鼓山墓地、竹园沟墓地等,其他地区如泾阳高家堡戈国墓地、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、滕州前掌大墓地等,故而有学者认为这道“禁酒令”是失败的。其实不然。这些墓葬虽然随葬了很多酒器,但墓主并不是姬姓周人。琉璃河燕国墓地中出土的酒器数量明显比食器少,而燕国是召公的封地,召公是姬姓周人。因此,这道“禁酒令”的适用范围很有可能

仅限于姬姓周人内部,非姬姓贵族并不受此令的约束。

周人禁酒,也并非彻底禁绝、滴酒不沾。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克罍便是燕国第一代国君克自己铸的酒器,说明适当饮酒仍然是被允许的。《尚书·酒诰》载:“饮惟祀,德将无醉。”意思是只有在祭祀时才可以饮酒,并且要用德来扶持,不要喝醉了。《酒诰》对饮酒的场合做了限定,并且限制了饮酒的量。由此可见,“禁酒令”实质是在姬姓周人内部限定饮酒的场合,减少饮酒的次数,控制饮酒的量。通俗地说,就是少喝酒。

周人颁布了“禁酒令”之后,开始探索自己的礼器制度。到西周中期,周人形成了鼎簋搭配的“列鼎制度”,鼎与簋都是食器。爵、觚、斝、觶、尊、卣、彝等酒器在西周早中期逐渐减少直至消失。中国青铜时代的礼器制度从商人的重酒转向了周人的重食。经过几十年春风化雨般的潜移默化,殷遗民终于抛弃了自己的酒礼器,融入了周人的大家庭中。用长时段的视野来看,周人的“禁酒令”无疑是成功的。

警钟长鸣,殷鉴不远。“少喝酒”不仅对于周人影响深远,对于当代人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(作者系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实习研究员)

秦腔不唱吼起来

◎雍城一舟

秦腔为什么要“吼”唱,这跟秦腔的渊源有关。

我国自周代以来,陕西关中地区属秦国的领地,就被称为“秦”。秦国的两个重要都城——雍城、咸阳,自然是当时秦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两个中心。据考证,秦腔的戏剧雏形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。最初用于助战战争,士兵用两根枣木棒打击节奏,清脆响亮,同时大声吼叫,再伴随鼓声,以鼓舞军人士气,扬军威。后来,梆梆声加上呐喊声发展成军乐声。而后,这种军乐声又演变成军官和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乐趣,喊声变成说唱,也就是后来的“乱弹”,表演者既唱又说还跳。在如今陕西、甘肃一带,这种表演逐渐传到了民间,递变形成一套较为成熟、完整的表演体系,表演技艺朴实、高亢、豪放,富有夸张性,生活气息浓厚,老百姓也喜欢上这种梆梆腔,秦腔由此得名,又叫梆子腔。秦腔,中国最早的戏剧诞生了。秦统一六国后,秦腔甚至流传大江南北,深刻影响了各地其他剧种的产生和发展,比如流入山西成为晋剧,在河南为豫剧,在河

北为河北梆子,等等。

据文献记载:“秦腔形成于秦,精进于汉,昌明于唐,完整于元,成熟于明,广播于清,几经衍变,蔚为大观。”无断代传承,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戏剧鼻祖。清代康、雍、乾时期秦腔流入北京,又直接影响到京剧的形成。不管秦腔怎么衍变,“吼唱”这一特色始终没有变。

作为一种地方剧种,秦腔的唱、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,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的一些诗、词、曲的语言。这些语言特点与音乐特点相融合,共同形成了独特的声腔风格,即语调高亢激越,语音生硬饱满,语气硬朗结实,句式以十字句、七字句、五字句为主,散文句为辅,戏词如同一首无韵诗歌排列整齐,与秦人“生冷蹭倔”的性格一样,说话干脆利索、宽音大嗓、直起直落,绝不拖泥带水、曲里拐弯,民风敦厚好义、耿直较真、勤劳勇敢。在如此氛围下诞生的秦腔,在听不懂陕西方言、体味不到秦腔特色的人眼里,说话就跟骂仗一样,唱戏就跟吼叫一样。

因为秦腔的渊源来自于底层



宝鸡市戏曲剧院秦腔历史剧《谢瑶环》 祝嘉 摄

士兵敲击木棒的呐喊声,不是阳春白雪,所以在西北尤其陕甘一带的老百姓最好这一口,把秦腔称“大戏”,高兴时“吼”上一段,高亢的吼声惊醒四野,荡气回肠;悲伤

时“吼”上一段,悲愤的吼声壮怀痛楚,苍凉深沉。“吼”是呼喊,是欣喜如狂,是撕心裂肺,是抒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育

一方文化。秦腔源于渭北台原,流行于大西北,地理形态决定了秦腔“高昂激越”的特点。当然,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在兼容中发展前行,古老的秦腔也不例外。